

真理·学习·方法·人生

李光远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三杰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制：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理·学习·方法·人生/李光远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

ISBN 7-80178-297-6

I. 真… II. 李…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9763 号

书 名：真理·学习·方法·人生

作 者：李光远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5

字 数：199 千字 印 数：1000 册

定 价：2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自序

——经济学以外的思考

我1946年秋至1950年夏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书。前两年多，北平城和清华园还没解放，课堂上学资产阶级经济学；课下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工友夜校的工作和争民主争和平的学生运动。解放后的一年多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1950年秋起，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先在干部教育科（后改称理论教育处）、学习室，后到讲师团。一边工作一边自己也按照在职干部教育计划，按部就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门基础课，同时到人民大学为在职干部举办的夜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和中共党史。通过学习，自觉抛弃了从旧社会旧教育中来的旧思想，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从此服膺终生。1955年上半年脱产到中央党校理论教员培训班学政治经济学。结业后，又与几位准备到市委讲师团做专职理论教员的同志一起，花了大约三个月时间，日夜兼程攻读《资本论》。接着，我开始给在职干部中级班讲政治经济学，并给全市兼职理论教员开辅导课。我只有那么一点薄薄的基础，只能讲一些初步的书本知识。

我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真正入门和起步，始于1958年秋至1966年5月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编辑部工作期间。这七年半，我作为理论组组长，负责经济、政治、哲学、

党建等理论和其它学术问题的编辑。我跟着邓拓同志学习当编辑、写文章、研究问题，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和分析现实问题。当时写文章，涉及问题比较宽泛，谈经济问题的有五六篇。值得一提的经济论文只有两篇：《在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上承认差别的意义》（载《前线》1961年第11期）和《“劳动力所有制”的提法能够成立吗？》（载《新建设》1962年第8期）。前者根据党中央当时的新精神，讲坚持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反对平均主义。后者对一些时兴的观点提出质疑，引起经济学界和宣传部门的注意，中宣部的内部刊物转载了主要内容。两文从不同的侧面接触到“公有制和劳动者个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后来多年从经济学角度关注和探究这个课题的起点。

“文革”期间，我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漏网右派”，被“永远清除出党”，到山区农村劳动改造。理论学习和写作被迫中断。

平反以后，1978年重返理论宣传战线，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在经济编辑部工作，直到1986年12月31日从经济编辑部主任的岗位上离休。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重新拿起笔，写了大约30几篇论文，发表在《红旗》、《求是》、《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学习与研究》、《学术月刊》、《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大多是联系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来探究“公有制与个人”（或扩展一点说，“社会主义与个人”）这个课题；写了一本小书《社会主义与个人的解放》（1991，福建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论文选集《劳动者个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1998，经济科学出版社）。其中一篇《共同富裕——社会

主义的旗帜》意外侥幸获 1996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还翻译了一本书《西方人看个人主义》(2002，红旗出版社)。

由于我近 20 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是讲经济理论的，我常常被当作经济理论工作者，甚至被一些人谬称为“经济学家”。其实，说来惭愧，除了与“公有制与个人”这个课题有关的那些经济理论问题以外，我对其他许多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问题都没有怎么钻研过，懂得很少。而且，这个我特别关注的课题也难说就是个经济学问题。它涉及政治、哲学、社会、教育、伦理等诸多学科。我的兴趣、学习和写作并没有专注于经济学领域，往往也喜欢思考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对其中与这个课题有关的问题，例如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发展等，关注更多一些。出于工作的需要，也由于自己在经济学领域以外的涉猎时有所得，我在“文革”之前和改革开放以来都发表过一些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讨论真理与实践、调查研究、读书学习、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个人与集体、人生观和道德修养等常在常新、人人关心的问题。现在从中选了一些思想依然鲜活，有现实意义的编成这个文集，把涉及的主题归纳起来，定为书名：《真理·学习·方法·人生》。希望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或有所借鉴。

“文革”前的文章虽然是在“左”的思潮的笼罩和影响之下，但是我总是本着一颗追求真理的赤子之心坦述自己的理解，实话实说，不说自己不懂的和不相信的话，力戒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虽然在“文革”中遭到错误的批判，但是自认为正确的思想我不可能放弃。改革开放时期写的文章中，有些思想就是过去被

错误批判过的观点的继续和发展。现在把“文革”前后不同历史背景下写得主题相近思路相通的文章编在一起，可以看到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坚持和我的认识演变的轨迹。

全书的文章按照主题分为六组，下面分别说说这些文章写作的背景和现在选辑重新发表的理由和现实意义。

第一组，讨论真理和规律的客观性、认识的过程以及怎样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开头两篇谈真理有没有阶级性问题的短文，坚持和强调真理的客观性。第一篇发表于1965年5月《前线》第10期。那时，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的思潮的影响下，有人公开申明：真理有阶级性。对此，许多人想不通。不少读者给编辑部来信问这个问题。我也想不通。因为我认为，真理，就其客观内容来说，也就是作为客观真理来说，是不因不同阶级而有所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过，在阶级社会，人们对客观真理（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真理）的认识、解释和运用是受阶级的影响和制约的，也就是说是有阶级性的；因而，学说、理论、思想体系（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有阶级性。我想，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来我得知他们正准备组织在报纸上公开讨论，于是又写了《再谈真理有没有阶级性》（《前线》于9月发表），回答对上述论点提出的各种疑问，强调在我所说的意义上坚持真理没有阶级性，就是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有阶级性就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也就否定了客观真理。虽然这两篇文章在“文革”中被说成是毒草，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今天我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并仍然认为，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三篇短文《规律能发生“作用”吗?》写于1991年8月,原是应邀为《我的经济观——当代百名经济学家自述》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写的一篇约三万字的经济学论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劳动者的地位和经济学的任务》的结尾部分的一小段,由于谈的是哲学问题,所以摘出来收入这个文集。短文强调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疑经济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的种种关于规律的“作用”的议论,如说规律的作用有大小、方向、性质、发挥程度的不同,人们可以使其充分或不充分发挥,可以利用、限制或防止某些作用,说规律会向人们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人们必须遵从不能违背,等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以后,这种议论充斥我国和苏东各国经济学的论著。许多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已知的几条经济规律(如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等)的作用。我注意到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绝少像这样议论规律的“作用”。我逐渐认识到,严格地说,上述种种议论都背离了规律的客观性,甚至“规律的作用”本身就不是一个严谨准确的科学概念(起初在我的一些经济文章里也未经深思熟虑地用过这个概念)。把研究已知规律的“作用”当作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而不注意去发现新的规律,深化对已知规律本身的认识,这严重地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这种想法,我大约在1961年就开始酝酿了。那年5月写了《以客观规律为行动的向导》这篇读书笔记,现在也收入这本文集(本书第4篇),与30年后写的这篇短文列在一起。

关于认识过程和实践标准的几篇文章(第5—9篇)强调认识需要反复,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真理是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过

程。

第二组文章，讲怎样做真正的调查研究，反对调查研究中的主观主义。

1961年，毛主席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纷纷响应，果然调查成“风”。可是，一些调查却并不反映真实情况，或是调查者受骗，或是为了迎合上级，有意骗人。于是党中央和北京市委都强调，调查要真正从实际出发，防止主观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1961下半年，我奉邓拓同志和编辑部主任之命，写了两篇社论，《调查研究不可从“框框”出发》（第10篇）、《调查研究一定要眼睛向下》（第11篇）。文中说，不可为了“迎合领导者的口味”，“领导上要什么，就有什么”；“要敢于实事求是地推翻一切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原有的判断和决定”。

这一组另外两篇（第12、13篇）写于1963年，提倡“蹲点”，探讨在调查研究中，应采取的立场、态度、步骤、方法；从事先的准备、定题目、拟大纲、搜集与鉴别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直到做结论，都谈到了。总的精神，也是提倡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调查研究，防止主观主义。

现在我想，为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今后仍然要尊重客观真理，尊重客观规律，要提倡做真的调查研究，反对走过场摆样子形式主义的假调查研究，防止调查研究中的主观主义。所以，这四篇文章连同第一组那些强调真理客观性，强调认识需要反复和实践检验真理过程的复杂性的文章所提的问题都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那些议论也许有可参考之处。

第三组文章，谈读书、学习。

我到《前线》之前写的文章只选了一篇编入这个文集，即《注重解答疑问》（第 15 篇）。此文原发表于 1957 年第 2 期《学习》杂志。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现在重新发表还有什么意义吗？

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北京市委讲师团做专职理论教员。文章主要是批评一些教员讲课不针对听者的思想，不注重解决疑难，只顾照本宣科的教条主义。我很怀念北京刚解放那两年听一些领导同志和从老解放区来的学者（如杨献珍、艾思奇、田家英等）做大报告，上大课。道理新颖，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很强，既生动，又解渴，真正能够释疑解惑，提高认识。后来这种报告少了。从苏联传来的那种死板生硬照念讲稿的讲课多了。讲课者似乎以为，只要宣布某一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马恩列斯毛说的，听者就会毫无疑问相信它是正确的，根本不需要讲它为什么是正确的。也不管听者有什么疑问需要解答。我对这种讲课法很反感。所以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能希望任何人不经过怀疑就相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教信条是只许盲从，不许人提出疑问的……马克思主义则允许对它的任何一个原理提出任何的疑问，因为它是科学，它能解决疑问，它就是为了解决劳动人民的疑问才产生的，并且通过不断地解决疑问而发展。”并且举例说，在讲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时，就需要回答一些具体的疑问。这篇文章，包含着我自己通过不断解决疑问而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是实话实说。到《前线》后写的几篇谈读书、学习的文章（第 14、16、17 篇）也说，要“独立思考”，“勇于提出问题”，“问他几个为什么”，“不迷信”，“不盲从”。“文革”中，这些观点被当作右派言论遭到批

判。但我至今不悔，仍然常用这些话自勉。

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和人们头脑里需要回答的新问题日见其多；另一方面，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力图扩大在中国的阵地。因此，我的文章中批评的那种照本宣科式的方法更加不灵了，应予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通过不断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我希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学能够按照“三贴近”的要求进行改革，使之更生动、更活泼，更能有效地解决人民的疑难问题。

这一组文章最后一篇《学会读书》（第18篇）是1984年我在红旗杂志社的内部讲话稿。那时杂志社为青年编辑们办业务培训班，几位老编辑分题讲课，一人一题。我讲“编辑和读书”，主要内容来自我在《前线》和《红旗》工作和学习的经验。希望这些经验之谈对今天的青年读者会有所帮助。

第四组文章，总题目是“讲求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这一组文章主要是写我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心得。我在《前线》工作期间，在一段时间里，以唯物辩证法作学习的重点，写文章常常喜欢讲怎样用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提出的问题。例如，《前线》创刊后，正赶上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发表，邓拓同志要我写一篇学习笔记。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性很强的题目，我不从政治上谈，却以《学习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的方法》为主题和题目，从“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的辩证统一关系讲到唯物辩证法的功用。1960年10月，邓拓同志要我写一篇社论，配合宣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写什么，怎么写，都没有交代。我刚刚拿到书，

匆匆忙忙通读一遍，感到内容丰富精彩，涉及许多复杂的大问题，一时不知从哪里下笔。忽然想到，何不以毛主席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问题为主线，把全书串起来？于是思路豁然贯通，文章也出来了，题目定为《战无不胜的哲学》。1961年4月，古巴击溃美国入侵军的消息传来，邓拓同志要我写一篇评论。我的国际时事知识极少，对这事件的详细过程原来也不很了解，又从来没写过这类文字。只好选择从历史的辩证规律说明古巴人民必然胜利这个角度立论，写了《胜利一定属于古巴人民》。这几篇急就章虽然当时都得到邓拓同志的肯定，没怎么改就发表了，但毕竟有些讨巧，不足为训，因此都没有编入这个文集。不过，这些急就章和其他许多文章的写作，对我都是练习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机会。我每每尝到甜头，越来越体会到，唯物辩证法作为一切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确实也是一个万灵的方法，可用来分析一切问题，屡试不爽。可以说，那时我写的文章，有许多篇里包含着我学习唯物辩证法的体会。

编入这一组的文章的特点在于讲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即认识过程和工作中的辩证法。这类文章往往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距较远，比较超脱，有些脱离当时的实际。突出的例子是1965年冬写的几篇。那时，农村“四清”运动正热火朝天，编辑部主任带领大批干部下乡参加运动。我先是被指定留在机关临时参与主持工作，后来，邓拓同志考虑到不能让我错过到运动中去锻炼的机会，派我也跟去，到延庆县白河堡公社。名义上也参加运动，实际上却仍然带着编辑部的任务，大部分时间关在屋里写文章，处理稿件，只是偶尔去旁听一些会议，体验体验“激烈的阶级斗争”。我身处暴风雨旋涡的中心，思想却依然沉湎于对“工作中

的辩证法”的思考。例如，这组文章的最后两篇署名“于白河”（寓意写于白河堡）的文章《怎样正确对待不熟悉的工作》（第 25 篇）、《论具体领导》（第 26 篇），就都没有宣传当时那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当时许多报刊文章里那种战斗精神和火药味。不过，这类文章，也许正因为缺少当时的时代气息，讲了一些普遍性的现在人们也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更适合今天的读者的需要。

第五组，记录我对人生观和个人自由发展问题的思考。

这组文章与我多年关注的“社会主义与个人”这个课题的关系比较密切。

当时写宣传大庆人的革命精神和学习雷锋、焦裕禄、王杰等英雄人物的几篇文章，既是为执行任务，也是由于我深深地被这些英雄们的业绩和精神所感动，要写自己的感受和理解。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文中反复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革命”。可是，最感动我并且引起我深思的，不是这些，而是他们对千百年来众多哲人和亿万普通人反复思考、争辩的一个老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用行动给了十分坚定明确的回答：为祖国和人民活着，最有意义。我以为，与他们的言行相对照，宣扬个人主义人生观的人，应哑口无言，无地自容。

那时，正逢中苏大论战。1964 年苏联报刊大肆攻击雷锋精神，污蔑“甘当螺丝钉”是提倡“盲从”、“奴隶性”，“抹杀”个人自主性。这促使我重新读了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马克思的有关论著，探究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创造历史和服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人作为目的和人作为手段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理论，写了一篇 1.5 万字的长文，批判苏联报刊

的谬论，送给专为批判修正主义那年十月刚刚创刊的《前线未定稿》（限内部发行）。彭真同志亲自审阅，认为可用，建议把问题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加强从政治上批判的力度。于是我按照这个精神，并联系苏共纲领宣扬个人主义的观点对文章做了修改，把题目定为《批判赫鲁晓夫集团的个人主义世界观——从苏联报刊攻击雷锋思想说起》。此后，我继续关注个人作为党和人民的工具与发挥个人主动性的关系这个问题。两个月后，在《前线》上发表《“做党的工具”不是做领导人的工具》（第29篇），批评有些人提出的“要当好本单位领导人的工具”的口号。我拥护刘少奇同志“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提法。我认为，人跳不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在阶级社会，个人跳不出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为这个就为那个阶级服务，不做这个阶级的就做那个阶级的工具。要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不是提倡盲从，是要求自觉为党的事业奋斗。这应不妨碍而且要求发挥个人的创造性。鲁迅“甘为孺子牛”，不是成了最有创造精神的伟大作家吗？但是，决不能把做党的工具歪曲为做领导者个人的工具。那样就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组织纪律，那才是提倡盲从和奴性。

对英雄们思想的学习和对“螺丝钉”、“驯服工具”口号的思考，是我从历史观和人生观的角度探究“社会主义与个人”这个课题的起点。

经过“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越来越感到个人问题的重要性。“文革”前，我考虑较多的是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和社会的关系，确立正确的人生观；“文革”后，则更多考虑问题的另一面，即社会如何看待个人，包括如何看待个人的地位、作用、权利、利益、责任、尊严、自由、积极性、发展等。考虑重

点的这种转移，开始于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社会主义与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红旗》1979年第3期）和随后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人》（《红旗》1984年第11期）。因此，我从这两篇经济论文中选取一篇，即后一篇，破例编入这本原定不收录经济学文章的文集，作为唯一的例外。

我在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文章针对的是新时期的新问题，但若追溯思想源头，有些也可以说是我在《前线》时开始的思考的继续。

我一向认为，社会主义是否应该而且可能以及怎样保证，全体和每个劳动者个人真正处于主人的地位，享有应有的利益、权利与自由，发挥更大的作用，具有更大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世界历史性课题。现在我想，保证全体劳动者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个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是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第六组是我离休后三篇怀旧的文章。一篇追记邓拓同志对《前线》编辑人员的教诲。两篇追念我从中学毕业直到参加工作后时时不忘的纯真的友谊。把这类文字与前边那些论文编在一个集子里，似乎不大协调。但同是我的心声，我愿同样袒露给我的读者。整个文集中，只有这三篇不是发议论，而是叙事和抒情，也可使读者换换口味。

（2005年9月）

目 录

自序

- 经济学以外的思考 (I)

真理与实践

1. 真理有没有阶级性? (2)
2. 再谈真理有没有阶级性 (5)
3. 客观规律能发生“作用”吗? (13)
4. 以客观规律为行动的向导
——学习马恩列斯毛有关论述的笔记 (16)
5. 为什么不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实际 (30)
6. 怎样用实践来检验认识
——谈谈实践检验认识的过程中的几个矛盾 (34)
7. 关于“思想正确有时也会暂时失败”的问答 (46)
8. 错误思想也是对客观外界的反映吗? (51)
9. 认识要经过反复 (54)

识别真的与假的调查

10. 调查研究不可从“框框”出发 (64)
11. 调查研究一定要眼睛向下 (69)
12. “蹲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73)

13.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

——关于调查研究怎样防止主观主义的讨论小结 (79)

独立思考，学以致用

- | | |
|----------------------------|-------|
| 14. 学·思·用 | (98) |
| 15. 注重解答疑问..... | (101) |
| 16. 说练习 | (104) |
| 17. 学习的生动活泼和主动性从何而来？ | (106) |
| 18. 学会读书 | (112) |

讲求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 | | |
|---------------------------|-------|
| 19. 变不利为有利..... | (128) |
| 20. 从落后到先进..... | (133) |
| 21. 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标准 | (137) |
| 22. 不要简单化，不怕复杂性 | (143) |
| 23. 树立对立面和发扬革命创造精神 | (147) |
| 24. 从全局观点出发 | (151) |
| 25. 怎样正确对待不熟悉的工作..... | (156) |
| 26. 论具体领导 | (161) |

提升人生境界与个人自由发展

- | | |
|-----------------------------------|-------|
| 27. “从善如登” | (170) |
| 28. 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工作结合起来 | (173) |
| 29. “做党的工具”不是做领导人的工具 | (178) |
| 30. 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光辉
——读王杰同志日记 | (185) |

31. 以革命的精神来工作	(195)
32. 件件都是头等品	(202)
33. 做焦裕禄式的革命干部	(206)
34. 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人	(212)
35. 个人自由发展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227)
36. 尊重个人价值，批判个人主义 ——《西方人看个人主义》译后记	(232)
37. 自私是人的天性吗？	(239)

真情永念

38. 永志不忘的教诲	(248)
39. 永远的怀念	(251)
40. 结伴“还乡”散记	(258)

附 录

作者著译目录(1950—2005年)	(274)
--------------------------	-------